

# 近年来前南斯拉夫地区文学一瞥

舒荪乐

**内容提要** 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政治震荡导致该地区的民族纷纷独立，这种局势成为该地区许多作家的精神思想和创作的源泉，尤其是一批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对民族、国家和文化身份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本文关照了克罗地亚、黑山和马其顿几位作家的精神世界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以管窥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文学的近况。

**关键词** 前南斯拉夫地区文学 乌格雷希奇 迪姆柯芙斯卡 尼古拉迪斯

南斯拉夫解体前是一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黑和黑山等六个平等的自治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执政。1990年初，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斯洛文尼亚共盟宣布只同南共盟保持“合作”关系。随后，克罗地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共盟也相继更名或改组，拉开了南斯拉夫国家全面分裂的序幕。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共和国、波黑纷纷独立，塞尔维亚和波黑组成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波黑，南斯拉夫随之成为一个历史名词。2006年，塞尔维亚和波黑解体。在这十几年中，国家解体引发的大大小小的战火不断，后来又受到北约的外部干预，这片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欧洲火药桶。

南斯拉夫的解体实现了各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却无法抹杀这些民族同宗同源的事实。亨廷顿指出，民族组成的诸多要素中，位于核心的是宗教和语言，相对于宗教，语言又是更为外露、历史更悠久的民族属性<sup>①</sup>。赫尔德也认为“以共同的语言为基础组成民族是人类最自然最系统的组合方式”<sup>②</sup>。因此，语言的这种神圣属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却也很容易“成为某些民族（如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政治争斗的借口和工具”<sup>③</sup>。解体前，南斯拉夫各国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① 详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② 引文出自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转引自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期，第6页。

③ 戴曼纯、朱宁燕《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6页。

语，解体后，这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了符合国家自身政治发展需求的变化。比如，塞尔维亚语现在使用西里尔字母，而克罗地亚语则使用拉丁字母。另外还有一些词汇表达上的不同，但总的来说，这些语言之间的相似度极高，他们的人民之间基本可以说着自己国家的语言实现无障碍交流。国家的独立和语言的变体，从个体经验上来说，都会引起分裂的痛苦，这种痛苦成为前南斯拉夫地区作家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

—

2017年，克罗地亚作家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šić, 1949—）获得了2016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sup>①</sup>。早年间，她曾致力于小说创作，其《在命运关口的斯特费·斯派克》（*Steffie Speck in the Jaws of Life*）和《跋涉于意识之流》（*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两部小说都趣味十足，是充满讽刺和黑色幽默的虚构作品。要不是国家分裂，乌格雷希奇也许仍在创作小说。1992年，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乌格雷希奇被迫成为克罗地亚人。战争爆发后，乌格雷希奇表达了自己反战的立场，同时也批判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倒退式的民族主义情绪。

弗洛伊德提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在两个民族的想象中就会显得越大，这就是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也就是说，敌对双方都需要对方来提醒自己他们是谁。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他们说着几乎同样的语言，都曾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铁托试图在南斯拉夫内部统一各民族，在个人独裁基础上遏制民族主义的模式，但在铁托执政的后期，南斯拉夫已经按照种族的线条开始不断溃败，在铁托死后，这样的统一路线必定得不到延续。两个差异性极小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政客都认为对方才是那个应该受到惩罚的人，政治精英们为掌握权力而操纵民族情绪，他们利用民族主义的语言游戏为自己的恐惧发声，“民族主义最终令巴尔干地区的每个人都陷入‘纯粹’种族身份的幻想中”<sup>②</sup>。

乌格雷希奇看到了分裂背后荒诞的悖论，自然也就成为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一些民族主义记者的攻击目标，长期受到排斥和骚扰。<sup>③</sup> 鉴于此，乌格雷希奇只能离开克

① 由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及其下属期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设立，每两年颁发给一位作家，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

② 详见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成起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7-31页。

③ See Dubravka Ugrešić, “A Girl in Litland: The 2016 Neustadt Prize Lecture”,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anuary-February (2017), p.59.

地亚，但离开就意味着需要面临一系列问题。乌格雷希奇指出：“我曾是一个南斯拉夫作家。接着，战争来了，克罗地亚人塞给我一本蓝色的克罗地亚护照。克罗地亚政府期望公民们的身份认同能迅速发生转变……但这种情况在我这儿并没有发生，他们把我排除出了他们的文学界和其他一切领域。我手中握着克罗地亚护照，同时抛弃了我的新居所和被摧毁的旧家园，投身进入了这个世界。”<sup>①</sup> 乌格雷希奇将受到的创伤化成笔下的作品，把个体经验与政治相结合，道出了流散经验的普遍性。乌格雷希奇的早期流散经历与祖国南斯拉夫的解体这一事实是分不开的。在1993年出版的《祝你好心情：从巴尔干战争到美国梦》中，她描述自己在萨格勒布排队等候领取身份证时的遭遇：当她被问到国籍时，她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被归类为任何一个民族”<sup>②</sup>。乌格雷希奇的早期作品更多地聚焦在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上，将国家的分裂与个人经验混杂在一起，表现出了理想主义者的愤怒与激情。

散文集《无人在家》（*Nobody's Home*, 2008）则显示出乌格雷希奇与她的流散身份达成了和解，她由一个局内人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尽管旁观对她来说或许更痛苦，因为身份问题始终是裹挟着她前进的一个“蜂巢”：“近几年来，每当我听到‘身份’这个词时，我总是有种严重过敏的感觉……别人都能控制自己的过敏……但对我来说，这就像是我对蜜蜂过敏，却不得不住在地球这颗蜂巢中。”<sup>③</sup> 在《无人在家》中，乌格雷希奇将她如火的激情转变成一种小火慢炖般的热度，这让她的作品味道变得更醇厚。她将更多文字投入在回应国籍的概念和文学作品被贴上标签后的接受问题上。她不再在国家层面上创作阴影和谎言的意象，而是变得更个人化，中心更尖锐，边缘更柔和，就像她把自己护照的经历扩展到了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上——我们该如何定义国家文学。从乌格雷希奇的生平来看，她对国家标签如何影响文学的观点是她在文学、艺术和批评的哲学思想中特别有趣的部分。她表示，今天的作家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贴上身份标签，而这些标签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市场上的地位，以及他/她与读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诚然，“身份”确实促进了市场沟通，但它们也严重削弱了文本的意义，使文本变得贫乏，或者被扭曲。文学文本比从前更关注一些特定的阅读关键词：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文化、性、政治，但同时这样的文

① Dubravka Ugrešić, “What is European about European Literature”, in Dubravka Ugrešić, *Nobody's Home*, trans. Ellen Elias-Bursac, 2008, New York: Open Letter, p.142.

② See Dubravka Ugrešić, *Have a Nice Day: From the Balkan War to the American Dream*, trans. Celia Hawkesworth, New York: Viking Books, 1995, pp.200-201.

③ Dubravka Ugrešić, “Identity”, in Dubravka Ugrešić, *Nobody's Home*, p.62.

本价值也会因泛滥而被市场削弱。<sup>①</sup>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给乌格雷希奇的颁奖词认为，她的作品从“早期的后现代主义经历到个人经历的悲欢离合，从家园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到她最近关于大众文学、文化的创作，罕见地结合了反讽、论辩和同情等特点”<sup>②</sup>。与许多其他欧洲文学不同，乌格雷希奇的作品是泛欧的，散文中涉及许多不同的国家，以及来自不同背景和国籍的人。这些非虚构的作品意在解释文中主人公处境的普遍性。同样，她的泛欧文学背景，给了她得以冷静审视例如分类、贴标签、顺从及服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危险性。<sup>③</sup>现在，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住在阿姆斯特丹，用克罗地亚语写作。她用讽刺和警世的散文作品，撰写着关于后南斯拉夫、欧洲和全球文化生活的文字。

## 二

战争对青年人的影响往往容易内化成向外抗争的动力，而抗争的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2013年欧盟文学奖获得者、马其顿作家莉迪亚·迪姆柯芙斯卡回忆道：“我记得在我国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曾经有一位年轻诗人介绍了一本诗集，当时他正在南斯拉夫军队服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克罗地亚军队抓住了他的部队，他和他的同伴没有任何食物和水。当这位诗人从战争中回到马其顿时，他成了一名僧人。另一位从南斯拉夫战场回来的人后来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sup>④</sup>

迪姆柯芙斯卡的小说《多余的生命》（*A Spare Life*, 2016）就描述了一对头部相连的连体婴儿泽拉塔和思雷布拉在极度贫困的外在条件下认识自我、努力寻找存在的意义和自我身份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南斯拉夫，泽拉塔和思雷布拉这对连体双胞胎成长在一间肮脏的公寓里，父母无论在情感还是经济上都无法迎接抚养她们的挑战。迪姆柯芙斯卡在作品中极力渲染了两姐妹令人窒息的生活细节：连体的头部几乎限制了她们所有的弯腰、踏步或转身的动作，因为这都需要两人作出绝对同步的姿态，就连上厕所也是一个难题。后来，思雷布拉考入了法学院，泽拉塔也被迫成

① See Dubravka Ugrešić, “The Writer and His Future”, in Dubravka Ugrešić, *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 Essays on Literary Trivia*, trans. Celia Hawkesworth, Springfield: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3, pp.110-111.

② “Dubravka Ugrešić: Laureate of the 2016 Neustadt Prize”,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anuary-February (2017), p.47.

③ See Alison Anderson, “Dubravka Ugrešić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Literature”,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January-February (2017), p.62.

④ Lidija Dimkowska, “How the Yugoslav Wars Shaped a Generation of Writers”, in *Literary Hub*, 7 October, 2016, <https://lithub.com/how-the-yugoslav-wars-shaped-a-generation-of-writers/>

为了法律专业的学生。当思雷布拉爱上达科时，泽拉塔也无法避开他们的每一个亲吻和每一次的亲热。她们连结的身体征服了她们各自独立的个性，两个女孩都是对方不情愿的俘虏，而这一事实几乎抹煞了她们之间所有的情感。两人甚至无法进行得体的争论，因为为了眼神交流，她们必须找一面镜子才能看着对方。双胞胎在二十四岁时决定进行脑部分离手术。评论者认为，手术结果的不确定性暗喻了二十世纪末的马其顿面临的来自种族仇恨的生存威胁。<sup>①</sup>

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马其顿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曾经见证过辉煌，也遭受过邻族的侵略。历史上的马其顿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南部地区，一直是重要的贸易和军事要道。古代的马其顿帝国兴起于此，待马其顿帝国灭亡几个世纪后，斯拉夫人才抵达马其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的军队占领了马其顿地区，于是马其顿的一部分归入塞尔维亚，称为瓦尔达尔马其顿，并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被保加利亚占领的区域成为皮林马其顿，属于希腊的部分则成为爱琴马其顿。1946年，瓦尔达尔马其顿从塞尔维亚分离，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1年9月7日，马其顿和平脱离南联盟后实行的宪法谈到了“马其顿共和国‘照顾’所有斯拉夫马其顿人，无论他们在哪里”。独立后的瓦尔达尔马其顿把皮林、爱琴马其顿看做单一地区，这无疑是一种更民族主义的看法。<sup>②</sup> 叶礼庭说：“多数局外人认为，所有的巴尔干民族都根深蒂固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sup>③</sup> 但正如前文中所述，种族差异本身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斯拉夫出现民族主义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当战争爆发，一切都与民族主义挂上钩时，所有陷入在种族的泥淖中的人们都会从冷漠变得极端地狂躁、焦虑。而《多余的生命》用自嘲、幽默的笔调，将两姐妹深思熟虑后所做的手术决定作为整部小说的结尾，并非意味着一种不确定的未来。手术代表着割离，这是两姐妹与彼此的割离，也是作家与令人窒息、崩溃的压抑环境所作的割离。

### 三

国家的分裂，亲人的离散，这些发生在眼前的创伤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七〇后南斯拉夫作家的艺术创作，他们至今仍能感受到南斯拉夫战争造成的后果，战争对当时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克罗地亚作家佐兰·皮利奇（Zoran

① See Lori Feathers, "A Spare Life by Lidija Dimkovska",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November (2016), p. 125.

② 详见约翰·R.兰普《南斯拉夫史》，刘大平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58页。

③ 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第31页。

Pilic) 曾说：“我的许多朋友自1990年代以来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今天，他们生活在每一个大陆上。这一代人的年龄大到足以缅怀这个前国家，他们是欧洲迷茫的一代受害者和游牧民，他们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地方。”<sup>①</sup> 战争爆发时，七〇后作家还在事业的起步阶段，他们目睹的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前南斯拉夫各地的作家都试图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直接描写战争：他们的作品表现方式各异，有些探讨历史事件，但更多的只是关于错位的经历，或者致力于探究民族、民族主义、自由、身份等问题。有一些人在寻求普适的政治主题，或试图探索其作为系统受害者的自我和解，还有一部分人在尝试着用幽默来对抗这些创伤性事件，这样的作品也被称为“后南斯拉夫写作”。2018年初，黑山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获得了它的语言专属代码，这对于一直徘徊在经济危机边缘、社会制度转型不甚明朗的黑山来说，正是一件象征着民族身份受到认可、提升民族自信心的标志性事件。

黑山的人口由黑山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还有几个少数民族。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弹丸之地上，民族问题往往会转化成各种社会问题浮现出来。近年来，受到国际文坛关注的，也是那些身上带有鲜明的民族身份认同元素的作家，比如安德烈·尼古拉迪斯（Andrej Nikolaidis，1974—）。尼古拉迪斯出生在萨拉热窝的一个黑山-希腊家庭，1992年，波黑爆发种族冲突后，他搬到了父亲的故乡黑山。尼古拉迪斯因他的敢说敢言以及犀利的批判性思维在黑山为人所熟知。作为一名支持独立的反战人士，除了反映南斯拉夫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之外，他的作品还坚定地倡导人权平等，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权利。

尼古拉迪斯的《降临》（*The Coming*, 2012）曾被节选入2012年达尔基档案出版社的“欧洲最佳小说”系列，受到世界关注。这部作品表面上看来是犯罪小说，但故事突然间随着一阵夏日飞雪，转变风格，成了历史小说。小镇被包围在一股神秘的氛围中，图书馆莫名其妙被烧毁，探长失踪多年的儿子又不期而至，被卷入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儿子引导读者进入历史，讲述了十三世纪末的异教徒弗拉·多尔奇诺的生活。弗拉·多尔奇诺曾宣称弥赛亚的回归，还揭露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阴谋集团成员萨巴泰·泽韦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后者坚称自己就是弥赛亚。故事的最后一章将过去和现在的一系列未解之谜糅合起来，强烈渲染了一种异常的环境色彩，创造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因而，最后一章将整部作品的调性定位在了后世界末日的基座上。

<sup>①</sup> Qtd. in Lidija Dimkovska, “How the Yugoslav Wars Shaped a Generation of Writers” .

尼古拉迪斯的第二部作品《儿子》（*The Son*, 2013）的主人公是第一部《降临》中探长的儿子，他四处游荡，在城中与麻风病人的家庭、妓女家庭和许多他曾试图避开的人相遇。在这部小说中尼古拉迪斯隐藏了主人公的姓名，描述了“一个无名英雄一生中的一天”<sup>①</sup>，他认为：“每个人都被永恒的追问驱使：苏黎世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梵蒂冈图书馆中的艺术史学家和乌尔辛吉的妓女，他们都离答案的距离一样远，因此也同样接近答案。”因而，叙述者最终的观点立足于“人类的不幸，并非来自社会制度或地理位置，而是来自于存在本身”<sup>②</sup>。人际关系和与上帝的关系被同样受到蔑视，这令人物产生了一种失去信仰的绝望感。尼古拉迪斯坦承，《儿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特的影响。伯恩哈特曾说：一个充斥着虚假、腐败和谎言的社会必定腐朽不堪。<sup>③</sup>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尼古拉迪斯的家乡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sup>④</sup>，战火在南斯拉夫地区蔓延，作家和他的家人从萨拉热窝被迫迁至黑山相对安全的地方。然而，黑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收入微薄，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极其渺茫。伯恩哈特的叙述者卷入了与那个社会的一场斗争中，就像尼古拉迪斯回到黑山后就一直与那个社会发生冲突一样，最终，《儿子》的叙述者明白，他与他者的冲突其实是一种内在冲突的外化：他必须与之斗争到底的真正敌人，其实是他自己。

与安德烈·尼古拉迪斯同为“黑山新浪潮”作家的奥格涅·斯帕希奇（Ognjen Spahić, 1977—）在2011年和2014年两次获得了欧盟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汉森的孩子》（*Hansen's Children*, 2011）被翻译成英文，进入了英语世界。这部小说记录了位于罗马尼亚与乌克兰边境村庄中的欧洲最后的麻风病院的故事。斯帕希奇接受采访时提到，这一故事构思来自他在日报社工作时耳闻的一则路透社新闻的标题。小说中的麻风病院至今仍真实存在。然而，他没有像一名新闻工作者一样去麻风病院一探究竟，而是循着标题，构思了这部半虚构小说。标题中的“孩子”指的是感染了由挪威外科医生格尔哈特·汉森首先发现的麻风杆菌的那些不幸的灵魂。这些欧洲最后的麻风病人如同囚犯一般被困在围着围栏、阴冷潮湿的三层疗养院里，他们凝视着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渴望有朝一日获得自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政权行将崩塌，围墙之外突然被剥夺领导权的齐奥塞斯库和围墙内部的领导权斗争同时出现，这样的

① Debjani Biswas-Hawkes, “Reviews: *The Son* by Andrej Nikolaidis”, in *The Literateur*, 2 Aug. 2013.

② See Debjani Biswas-Hawkes, “Reviews: *The Son* by Andrej Nikolaidis”.

③ Qtd. in Andrej Nikolaidis, “Andrej Nikolaidis on Thomas Bernhard”, <https://winstonsdad.wordpress.com/2013/06/13/andrej-nikolaidis-on-thomas-bernhard/> [2018-02-21]

④ Milovan Radojevic, “White Dogs”, trans. Will Firth,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March-April (2017), p.30.

情节设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麻风病院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摇摇欲坠的东欧社会的投射，病人之间的各种权力争斗与历史变革的潮流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病院很快演变成暴力和谋杀现场，院内被杀害的尸体堆积成山，甚至引来了周围的疯狗。可病人们还满怀希望，幻想着他们面前的“新欧洲”。有评论者认为，“这不但反映了罗马尼亚不断恶化的局势，也暗示着斯帕希奇自己的巴尔干家园所面临的命运：权力斗争、暴力和死亡在小范围中逐渐升级”<sup>①</sup>。小说中的麻风病院喻指了处在混乱中的罗马尼亚，而麻风病毒却像是使南斯拉夫各国陷入疯狂战乱、最终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病因——一种使人狭隘、过度追求民族主义的病态精神。斯帕希奇用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故事来讨论诸如独立、认同等话题是需要勇气的。<sup>②</sup>他对于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感，完整地体现在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中，他说：“在我看来，今天我仍在使用一种被前南斯拉夫两千万人民使用的伟大语言写作，而且沉浸在这种语言中让我有种回家的舒适感。”<sup>③</sup>

文学是民族身份、国家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表达精神价值的主要媒介。南斯拉夫战争和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引起的各种问题，引起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对文学的重视。正如迪姆柯芙斯卡所指出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虐狂，在阅读文学和欣赏一般艺术时，喜欢的主题不外乎悲剧、悲伤、冲突、流放、难民等等，所有这些都存在于前南斯拉夫的作家们身上。<sup>④</sup>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描绘的悲剧促成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是战争给它们带来了读者、观众和在欧洲文学的立足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永怡

① Joseph Schreiber, "Finding allegory in an ancient disease: *Hansen's Children* by Ognjen Spahic", <https://roughghosts.com/2015/02/18/finding-allegory-in-an-ancient-disease-hansens-children-by-ognjen-spahic/>[2018-05-26]

② See Richard W. Jackson, "*Hansen's Children*, by Ognjen Spahic", in *Nudge*, 29 April 2013, <https://nudge-book.com/blog/2013/04/hansens-children-by-ognjen-spahic/>[2018-05-26]

③ See "EUPL 2014: Interview with Ognjen Spahic, Montenegro", [www.euprizeliterature.eu/author/2014/ognjen-spahic](http://www.euprizeliterature.eu/author/2014/ognjen-spahic)

④ Lidija Dimkovska, "How the Yugoslav Wars Shaped a Generation of Writers".